

内蒙古自治区地方志丛书

NEIMENGGU ZIZHIGUO ZHONGGUO CHANGDANG ZHIZHI

ᠨᠢᠮᠤᠩᠭᠤ ᠵᠢᠰᠢᠬᠤ ᠠᠨᠤᠨᠠᠭ ᠤᠯᠤᠰ ᠤᠨ ᠭᠣᠨᠠᠨᠤᠨᠠᠭ ᠤᠯᠤᠰ

内蒙古自治区志 共产党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第一篇 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重大活动

第一章 “五四”运动和大革命中的斗争

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1919年5月4日,中国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

第一节 “五四”运动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内蒙古地区革命工作的开辟

一、蒙汉各族青年响应“五四”运动开展反帝爱国斗争

“五四”运动时期,内蒙古地区归绥有土默特高级小学校、归绥高级小学校和归绥中学3所学校,学生总数约500名左右。此外,包头、赤峰、通辽、喀拉沁右旗也有一些小规模

的学校。 “五四”运动爆发时,在北京蒙藏学校求学的内蒙古蒙古族青年荣耀先、王祥等参加了北京的反帝爱国运动。事前,蒙藏学校的蒙古族学生荣耀先代表该校参加了北京14所大专院校的示威游行准备会议。5月4日,蒙藏学校的学生参加了北京学生在天安门前的集会示威。5月5日,荣耀先代表蒙藏学校参加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同时,在天津求学的内蒙古青年韩麟符、陈镜湖(化名李铁然)等,也积极响应了“五四”运动。赵瑞年等同学回到归绥,在归绥3所学校的师生中讲述“五四”运动的经过和学生们的爱国行动,揭露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罪恶阴谋,痛斥北洋军阀政府出卖民族利益的可耻行径,号召同学们行动起来,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五四”运动的浪潮波及到内蒙古地区。

当时,归绥各校纷纷举行座谈会,讨论如何响应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各校组织了学生会,领导学生运动。他们提出了“罢不罢,看北大;北大罢,我们就罢”的口号。5月中下旬,归绥约500多名师生举行了罢课。各校学生和部分教师组织了十多个小组,分头行动,游街走巷,散发传单,宣传“五四”运动,揭露巴黎和会的阴谋,尤其是逐条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与内蒙古命运休戚相关的“二十一条”(其中有五条针对内蒙古地区)。师生们高呼“反对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还我山东主权”、“惩办卖国贼”等口号。在青年学生爱国行动的影响下,归绥的绥远总商会也向全国发出通电,表示支持和拥护学生的爱国运动。与此同时,内蒙古中东部地区也爆发了以青年学生为骨

干的反帝爱国运动。这样,归绥学生界的爱国运动就汇入了全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的洪流之中。

内蒙古蒙汉各族青年,开展了以反对“二十一条”和“抵制日货”为主要内容的反帝爱国斗争。

“五四”运动以后,每逢“五四”纪念日和“五七”国耻日(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正式提出“二十一条”之日),绥远各地的青年学生都要举办座谈会,组织游行示威,重申“五四”反帝爱国口号,并在以往青年学生运动的基础上,组织成立了由归绥3所学校和1922年秋在归绥成立的绥远师范学校学生参加的统一组织——绥远学生联合会。在青年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中,李裕智(字若愚)、云泽(乌兰夫)、吉雅泰、奎璧、孟纯、佛鼎、多松年、云润、赵诚、于存灏、霍世休、范建中、刘生璧、康根诚、高布泽博等骨干分子崭露头角。

1923年5月,在日货充斥归绥市场的情况下,绥远学生联合会决定举行一次抵制日货的宣传示威活动,以实际行动回击日本帝国主义利用不平等条约、通过倾销商品进行的经济侵略,来纪念“五四”和“五七”纪念日。5月7日,归绥4所学校近千名同学,按预定计划整队来到归绥中学大操场,参加绥远学生联合会主持的“五四”、“五七”纪念大会。于存灏代表绥远学生联合会发表演讲,列举日本帝国主义在归绥进行经济侵略的种种事实,揭露其侵华实质。其他同学也相继发言。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行径,激起了全体师生的强烈愤慨,会场上响彻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废除二十一条”、“对日经济绝交”的口号。会后,各校师生从归绥中学出发,举行抵制日货的宣传示威大游行。游行队伍经过牛桥,进入旧城北门,沿大北街向大南街进发。同学们手执小旗,高呼口号,沿路遇有群众集中的地方,就发表演讲,散发传单,号召市民不买日货,号召商店不卖日货。李裕智、云泽、多松年等蒙汉族青年学生,是这次活动的组织者和骨干分子,他们带领同学们对市民群众进行演讲。强烈的爱国主义宣传活动感染了人们,数以万计的群众,包括商人、市民、手工业者都自觉加入到学生的游行队伍行列中,形成了全市性的抵制日货示威大游行。

二、中国共产党对内蒙古地区革命工作的开辟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共“一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党纲,规定党的奋斗目标是:以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阶级差别;废除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党纲还规定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党的纪律。

中国共产党首先从北京蒙藏学校开始,开辟内蒙古地区的革命工作。

蒙藏学校成立于1912年,座落在北京西城区石虎胡同,是中华民国政府蒙藏事务局为解决蒙藏少数民族子弟求学创办的民族学校。始办时只有中学班,后来设立了专科班。就读者主要是蒙族学生,也有极少数的藏族学生和个别汉族学生。“五四”运动后,蒙藏学校因经费困难停学,几经周折后于1923年复校。复校后不久,曾在蒙藏学校读书的荣耀先回到家乡绥远土默特旗,动员该地在归绥中学和土默特高等小学校读书和就职的吉雅

泰、李裕智、孟纯、荣照、多松年、云泽、奎璧、云润、佛鼎、赵诚、高布泽博、朱实夫等 30 多人到蒙藏学校。与此同时，内蒙古东部喀喇沁右旗的乌力吉敖其尔(吴献文)、王瑞符等和哲里木盟的特木尔巴根、乌云珠等一批蒙古族青年也进入了蒙藏学校。

李大钊多次来到蒙藏学校，与他们促膝谈心，交流思想，向他们分析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关系，阐述蒙汉族劳苦大众同受压迫的道理，指出各民族人民要想翻身得解放，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军阀统治、王公贵族、地主豪绅。党在北方的一些著名活动家邓中夏、黄日葵、赵世炎、何孟雄、刘伯庄以及李渤海、韩麟符、朱务善等，也先后到蒙藏学校开展工作，调查研究蒙古民族问题。他们同这些蒙古族青年学生谈心、交朋友，揭露北洋军阀压迫蒙古民族的事实，讲述帝国主义对内蒙古地区的种种侵略活动。

1923 年冬，中国共产党派人到蒙藏学校介绍国内外形势，传播马列主义思想，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在党的教育和引导下，1923 年底至 1924 年初，云泽、奎璧、赵诚、高布泽博、佛鼎、康根成、多松年、李裕智、吉雅泰、云润、孟纯、任殿邦、云霖等先后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建立了团支部，多松年、云泽先后任支部书记，该支部是蒙古族中第一个团支部。在党的培养下，从 1924 年下半年开始，多松年、李裕智、赵诚、奎璧、佛鼎、孟纯、云泽、云润、吉雅泰等陆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在蒙藏学校建立了蒙古族中的第一个共产党支部，多松年任书记。在北京的喀喇沁旗蒙古族青年白海风、吴文献(又名吴子微，蒙名乌力吉)等也在这一时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4 年上半年，中共北方党组织在北京宣武门内的一座古庙内，举办了马列主义研究小组，吸收蒙藏学校的多松年、赵诚、佛鼎等参加。在邓中夏、夏之栩、刘青杨等人的讲解和辅导下，他们系统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列宁主义基础》等书籍。通过学习，他们从理论上明白了蒙古民族贫穷落后受压迫的根源、蒙古民族的解放与中国革命乃至世界革命的关系以及中国革命的道路和前途等问题。

中共北方党组织还组织他们参加纪念“二七”大罢工一周年、纪念列宁逝世一周年等活动。1924 年冬，他们参加了欢迎孙中山先生北上和召开国民会议的各种活动，云泽(乌兰夫)、多松年、康根成等被抽调到北京地区党组织东城区办事处，参与大会的筹备工作。1925 年初，吉雅泰受党组织委派，回绥远地区组织了“绥远国民会议促成会”，发动绥远地区人民加入到全国拥护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人民运动中，并推选吉雅泰、奎璧、赵诚、高布泽博、崇德臣 5 人为“绥远国民会议促成会”代表，参加了孙中山、李大钊主持召开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此外，他们还参加了北京的“五卅”运动，吉雅泰还担任北京学生运动的副总领队，参与了组织工作，孟纯担任北京学联的常委。

李大钊及中共北方党组织为了保护和培养这批蒙古族革命力量，决定将他们分期分批送到苏联、蒙古人民共和国和广东等地学习深造。1924 年 4 月，先期选送荣耀先、白海风到广东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之后派王瑞符到第二期学习，1925 年底到 1926 年初又选送云继先、云星槎、荣崇仁、荣尚义(勇夫)、云继章、朱实夫等数十名蒙古族革命青年到第四期学习。1925 年上半年派奎璧、赵诚、佛鼎等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学习。同年冬，选送云

泽、多松年、云润、康根成、荣照等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5 年底和 1926 年初，从蒙藏学校和绥远、热河、察哈尔三个特别区分别选送贾力更、高布泽博、赵文翰、任殿邦、李春荣、麟祥、云继珍等 7 名蒙古族青年和王建功、郭宝安、郭宝山、左天顺、马德照等汉族青年，到毛泽东主持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 6 期学习。

1925 年初，李大钊委托邓中夏、赵世炎领导蒙藏学校的党团组织办一份刊物，多松年、云泽、奎璧等人接受了任务，开始筹办。1925 年 4 月 28 日，刊物正式出版，名称为《蒙古农民》。《蒙古农民》用蒙汉两种文字题写刊名，其内容丰富、主题鲜明、题材多样、语言通俗流畅、理论与实际联系密切，而且有各种醒目的栏目，如“政论”、“诉苦”、“醒人录”、“好主意”、“蒙古曲”等等。《蒙古农民》第一期第一篇文章以《开篇的话》为题，只用 16 个字，即“蒙古农民的仇人是——军阀、帝国主义、王公”，揭示了内蒙古的社会矛盾。

中华民国政府于 1914~1915 年在内蒙古地区先后设置了热河、察哈尔、绥远 3 个特别行政区，并在热河的承德、察哈尔的张家口和绥远的归绥分别设置都统府，掌握 3 特区的军政大权。以上 3 个城市再加上包头，中国共产党首先从这 4 个城市开始建立党的组织。

1925 年初，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决定建立中国共产党热河、察哈尔、绥远和包头 4 个工作委员会。3 月，李大钊派于树德和蒙藏学校学生吉雅泰、李裕智回归绥和包头以建立中国国民党党部的同时，建立了中共绥远、包头工委。同时派韩麟符、陈镜湖、张良翰（又名张次平）回热河和察哈尔以建立国民党党部的名义开展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1925 年在热河、察哈尔、绥远、包头建起了中国共产党的 4 个工作委员会。这 4 个委员会挂的是国民党的牌子，实际是在做共产党的工作。中共热河工委负责人陈镜湖、杜真生（后叛变革命），工委机关设在承德南营子三条胡同上口。同年 5 月 4 日，中共热河工委以国民党热河区党部的名义，在承德“演武厅”召开中小学和师范学生近千人参加的“五四”运动纪念大会，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在热河地区反响很大。中共察哈尔工委由张良翰、杨洪涛负责，工委机关设在张家口桥西的一间民房里。工委主要面向察哈尔特别区的城市、农村和牧区开展工作，与 1925 年初建立的以王仲一为书记的在工人和一些工厂中开展工运活动的中共张家口特别支部各有分工，互无隶属关系。中共绥远工委，吉雅泰任书记，工委机关设在归绥旧城巧尔气召。工委下辖萨县工委，李端任书记；和林县工委，万寿任书记；武川县工委，温财旺任书记；归绥县工委，赵绥恩任书记；土默特旗工委，书记是崇德臣、孙承业。工委在归绥的工厂、学校及其周围的旗县村镇积极开展工作，在当地群众，特别是蒙古族人民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中共包头工委，李裕智任书记。工委在工厂、学校、军队、商界以及郊区农民中广泛开展工作，并努力争取“哥老会”会员，同时还组织了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吸收地毯厂、铁工厂、泥木工场、甘草店的 50 多名工人参加学习，逐步发展了 30 多名党团员。

第二节 共产党对民族问题的纲领

1920年12月1日,毛泽东致信蔡和森,提出既要“在中国做事”,也要“在世界做事”,“如帮助俄国完成它的社会革命;帮助朝鲜独立;帮助南洋独立;帮助蒙古、新疆、西藏、青海自治自决,都是很要紧的”。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召开,《二大宣言》对中国边疆少数民族问题作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指出“联邦的原则在中国本部各省是不能采用的,至于蒙古、西藏、新疆等处则不然。这些地方不独在历史上为异种民族久远聚居的区域,而且在经济上与中国本部各省根本不同,因为中国本部的经济生活,已由小农业、手工业渐进于资本主义生产制的幼稚时代,而蒙古、西藏、新疆等处则还处在游牧的原始状态之中”,“尊重边疆人民的自主,促进蒙古、西藏、回疆三自治邦,再联合成为中华联邦共和国,才是真正民主主义的统一”(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74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根据这样一个基本分析,党的“二大”在《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中提出,“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为民主自治邦”,“在自由联邦制原则上,联合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同上,第36页)。这是中国共产党从国内民族问题的实际出发,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按照民族平等原则制定的第一个关于国内民族问题的纲领。它对于动员蒙古民族及其它少数民族,为争取民族平等和民族解放指明了方向。

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于1923年1月,在《平民主义》一文中指出:“现代政治或社会里边所起的运动,都是解放运动,人民对于国家要求解放,殖民地对于本国要求解放,弱小民族对于强大民族要求解放,农夫对于地主要求解放,工人对于资本家要求解放……这些解放运动,都是平民主义化的运动。”他反对民族压迫,主张各民族平等联合。他说:“中国的国旗上,一色分裂为五色,固然可以说是分裂,但是这五个颜色排列在一面国旗上,很有秩序,代表汉、满、蒙、回、藏五族,成了一个新组织,也可以说是联合……今后中国的汉、满、蒙、回、藏五大族,不能把其他四族作那一族的隶属。”并且断言:“凡是持大某某主义者,不论他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地方、一个军阀、一个党派、一个人,没有不归于失败的。”(《李大钊选集》,第415-422页,第421-422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在这里,李大钊将民族问题融入社会问题之中,阐述了民族问题与社会革命的关系,指出了民族问题的重要性和民族解放的必然性。

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蒙古民族问题在中国的民族问题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因此,陈独秀、李大钊也对蒙古民族问题提出了重要的见解和主张。1924年9月17日,陈独秀在《我们的回答》(《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576页,三联书店,1984年)中反驳国民党中一部分人的攻击时说:“民族主义有二种:一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主张自求解放,同时却不主张解放隶属自己的民族,这可称做矛盾的民族主义;一是无产阶级的民族主

义,主张一切民族皆有自决权,主张自求解放,不受他族压制,同时也主张解放隶属自己的弱小民族,不去压制他,这可称做平等的民族主义。”他指出:“蒙古人愿意脱离中国与否?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的自决权,用不着鼓动,我们也并不曾鼓动这个,我们只反对一班人否认蒙古民族的自决权,硬说蒙古是中国的藩属,主张军阀政府出兵收蒙,因此我们主张蒙古人根据民族自决权,有独立反抗的权利。”陈独秀还引用中国国民党一大宣言“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华民族解放,二则中国境内一律平等”,以及“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的主张进行驳斥。

1925年3月,李大钊发表《蒙古民族的解放运动》(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69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一文,以外蒙古的革命为例论述了蒙古民族的解放问题。李大钊深刻地分析了中国蒙古民族遭受民族压迫的历史与现状,首先揭露清王朝“外既不能抵抗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全中国,内复以种种手段防制境内各民族的政治自由。其对蒙古民族,纯用藩属政策,以笼络其王公及喇嘛,沦蒙古民族于外国的帝国主义、中国的帝国主义、蒙古王公的封建制度、喇嘛教的愚民剥削四重压迫之下,而未由解脱”。辛亥革命以后,“蒙古民族仍不免受与前日相同的压迫,或且更甚”。他详尽地叙述了孙中山先生领导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的民族政策,援引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中“对于国内之弱小民族,政府当扶植之,使之能自决自治;对于国外之侵略强权,政府当抵御之。并同时修改各国条约,以恢复我国际平等、国家独立”的主张,宣传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关于“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的民族政策。同时阐明了蒙古民族解放运动与中国革命不可分割的关系。他强调蒙汉“两民族在国民革命旗帜之下提携共进”,“严密的监视顽暴军阀之以旧日藩属征服的手段,施之蒙古民族,以防诱起国内民族间的嫌怨与纠纷,而为虎视于旁的帝国主义者所利用”。

1925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就中国革命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了决议。会议专门作出了《蒙古问题议决案》(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418-419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议决案》一开头就指出内蒙古地处祖国的北疆,“我们应当注意内蒙古的工作”,而且特意指出“我们的党应当注意内蒙古的特别情形——他们的经济利益和文化上民族上的问题,都有相互的关系”。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已经注意了内蒙古的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议决案》分析了内蒙古的阶级关系、革命形势和内蒙古民族解放运动与全国革命的关系以及革命运动中蒙汉民族间的关系,并提出了具体的要求,指出:“我们的党应当使蒙古人的民族解放运动与全中国的解放运动结合起来……内蒙古农民中的革命工作,应竭力联合中蒙农民以反对共同的仇敌:大地主、王公、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等,同时却不应当淹没蒙古人的民族利益。所以中国共产党指导之下的农工兵大同盟,要能联合内蒙古中蒙农民的斗争。”《议决案》提出“应当组织内蒙古国民革命党,这是蒙古人民的民族上、政治上的责任”,并进一步指出:“内蒙古国民革命党和内蒙古农工兵大同盟工作应当密切的联络,这

是中蒙农民中的革命工作能够有成效的一种保证。”《蒙古问题议决案》是指导内蒙古革命和蒙古民族解放运动的方针性文件。

第三节 共产党共青团组织的发展及群众组织建设

1925年10月,中共北方区委决定成立中共张家口地方委员会,李大钊派肖三任中共张家口地委书记,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分别为王仲一、江浩。中共张家口地委成立后,受中共北方区委委托,也兼管热河、察哈尔、绥远3个特区的工作。

1926年初,肖三调离,丁之任张家口地委书记,王仲一、江浩任原职,又派王一飞任军委书记,乐天宇任农委书记,张良翰、张书香、卢继亭分别负责国民运动、妇女运动和职工运动方面的工作。同时在铁路、工厂、学校、军队中广泛开展党的工作,建立了一部分党的基层组织。

中共张家口地委积极在归绥、包头等地开展工作。1926年初,在归绥成立了中共绥远特支,路作霖任书记,杨曙晓任宣传委员,支部成员有吉雅泰、彭振刚、刘进仁等。同一时期,在冯玉祥创办的包头《西北民报》社成立了中共《西北民报》支部,蒋听松任书记,马吉良任副书记,支部成员有胡英吉、丁宝铨、刘贯一(刘景熙)等。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北方军阀吴佩孚负隅顽抗,同时联合奉、晋、鲁各系军阀,以“讨赤”的名义对冯玉祥的国民军进行全面的军事围攻,京津及其以北地区一度置于反革命的屠刀之下。8月,国民军从南口全线溃败。9月中旬,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为策应南方的北伐,冯玉祥终止游苏,回国举行了著名的五原誓师。绥远地区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针对这种情况,1926年9月,中共北方区委决定建立中共绥远特别区地方委员会,熊味根、路作霖先后任书记。地委内设机构有宣传部、组织部、国民运动委员会、职工运动委员会、妇女部等。杨曙晓、麟祥先后任宣传部长,路作霖兼组织部长,吉雅泰任国民运动委员会主任并负责蒙古民族工作,路作霖兼职工运动委员会主任,杨曙晓兼副主任,贾玉琴、李士杰先后负责妇女部工作。地委下属中共归绥县委,路作霖兼书记;中共归绥县西区委员会,王建功任书记,张文理任组织部长,郝俊文代理宣传部长,委员郗敬书。

中国共产党在内蒙古地区发展党的组织的同时,积极进行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建设。

1925年5月,何孟雄奉派到京绥铁路工作。在开展铁路工人运动的同时建立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小组。10月,中共张家口地委成立时即组建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张家口地委,穆秉衡任书记,并在铁路、工厂和学校中建立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基层组织,开展青年运动,同时协助中共热、察、绥、包四工委开展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工作。

1925年初,吉雅泰领导的中共绥远工委就在归绥中小学开展青年工作,并发展了赵古铎等6名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1926年2月,共产主义青年团张家口地委相继派路作霖、彭振刚到绥远开展青年工作。他们以国民党党员的身份,以绥远西北职业学校为活动

中心,广泛与青年接触,陆续发展绥远省教育厅政报编辑部杨曙晓、《绥远日报》社编辑李子光(又名贾一中)、归绥中学陈国齐以及张献孟、张国林、崔书铭、丁育文、李福、张国玺、王培治、陈国才等10多名学生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分别设立团支部、团小组,路作霖任归绥团支部书记,受共产主义青年团张家口地委领导。1926年9月,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北方区委员会的领导下,建立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绥远地方委员会,杨曙晓任书记,组织委员张国林,宣传委员崔书铭,学生部由张焕文、刘进仁负责,工人部也由刘进仁负责。

1925年中共绥远工委成立后,首先加强了绥远学生联合会的工作。这时归绥除原有的4所学校外,还有新设的绥远五族学院、绥远女子师范学校、绥远职业专门学校等。中共绥远工委完善了学联的组织机构,加强了领导,由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张焕文任学联主席。学联下设总务、交际、募捐、宣传、纠察军等5个股,分别由归绥中学的张焕文、刘进仁、张国林、崔书铭和绥远师范学校的范建中负责,学联机关设在归绥中学。

1925年8月,京绥铁路总工会成立,会址设在张家口,下辖西直门、南口、康庄、张家口、大同、平地泉、归绥、包头等八大分会。当时归绥工业比较落后,除了铁路,几乎没有现代企业。福绥、福元毛织厂和铸造铁工厂,是当时较大的工厂,每厂工人也仅有二三十人。工人的劳动强度大,工资低,生活极为艰苦。吉雅泰、路作霖、杨曙晓等党团负责人,经常深入到工厂、铁路和人力车夫中宣传革命。工科大学毕业的路作霖还经常到毛织厂给工人讲解技术,密切了与工人的关系,并在福绥、福元毛织厂发展了钟舍声等团员,同时依靠这两个厂的工人,在翻砂厂、铸造厂、造纸厂、毛单行等工厂企业中成立了秘密工会。1925年寒假和1926年暑假期间,归绥的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在党的领导下,分别在归绥小学和民乐剧社组织了两期工人夜校,刘进仁任工人夜校校长,张焕文、张国林任主任,丁育文、崔书铭任教员。工人夜校的学员中先后有20多名青年加入了共青团。归绥地区的共青团组织以此为基础,在一些工厂中成立了团支部和团小组。

内蒙古地区的中国共产党组织从一开始就派人深入农村,教育、发动农民,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中共绥远特别区工委以国民党绥远特别区党部的名义,把党团员和一些进步青年召集到巧尔气召,宣讲农民问题,研究农运工作,并派人到归绥周围农村和土默川,调查研究土地问题与农民问题,对土豪劣绅进行初步的减租斗争。中共察哈尔、热河工委也积极开展农村工作,为发动农民运动创造条件。为了全面发动内蒙古地区的农民运动,在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下,中共热河、察哈尔、绥远特别区工委于1926年5月选派17名蒙汉族青年学生到毛泽东主持的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其中热河4人,察哈尔5人,绥远8人。毛泽东、萧楚女、周恩来、恽代英、李立三、彭湃分别讲授了以农民运动为中心内容的《中国农民》、《农村教育》、《地理》、《帝国主义》、《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社会问题与社会主义》、《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中国史概要》、《中国职工运动》、《海丰及东江农运状况》等25门课程,并进行了军训,还到农民运动形势高涨的韶州、海丰实地考察学习。内蒙古地区的这批学员毕业后立即回到各自的家乡,以农民运动特派员

的身份投身到正在兴起的内蒙古地区农民运动中。

1926年,在绥远特别行政区以归绥为中心,东到丰镇,西至萨拉齐,建立了部分县级农民协会,并普遍建立了区、乡、村农民协会。绥远特别行政区农民协会会长,由国民党左派人士李正乐担任;归绥县农民协会总干事,由国民党左派人士李致方担任,共青团员杨植霖任秘书。两级农会设在归绥旧城南龙王庙。据1926年6月统计,在察哈尔特别区也有区级农民协会1个,会员600人;热河特别区有区级农民协会5个,会员达2200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农民运动》,第18页,人民出版社,1953年)。是年10月,中共热河、察哈尔、绥远特别区赴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的青年,回到当地从事农民运动。贾力更、王建功、高布泽博、麟祥等回到绥远。麟祥留在国民党绥远特别区党部任农民部部长,其余人员深入到农村开展农运。贾力更、王建功在归绥以西毕克齐、兵州亥一带发动农民,扩大农会组织,开展反土豪劣绅、减租减息斗争。高布泽博在察素齐、萨拉齐一带开展农运。他们发动农民给土豪劣绅按劣迹排队造册,准备斗争,提出“打倒土豪劣绅”、“反对贪官污吏”、“反对苛捐杂税”等口号,向神权、族权和封建迷信、买卖婚姻等发起进攻,捣毁了毕克齐的耶稣教堂,反对神官巫师装神弄鬼,违者游街示众。中共包头工委在李裕智的领导下,主要在包头周围向以农民为主的“哥老会”会众开展工作,以配合归绥一带的农民运动。当时有数万名“哥老会”会众响应农民运动,形成了巨大的农民运动势力。中共热河工委、国民党热河特别区党部在陈镜湖的领导下,在承德、建平、赤峰、平泉、开鲁、林西、围场等县农村中广泛发动农民,组建农民协会,进行了多次反土豪劣绅的斗争。建平、赤峰等县的反苛捐斗争最为激烈,平泉县还进行了反烟捐斗争,捣毁了税捐局。中共察哈尔工委、国民党察哈尔特别区党部,在张良翰、杨洪涛的领导下,主要在察北一带农村组织联庄会,并曾率领1500多名武装农民,夺取土豪劣绅的粮食,开展夺粮斗争,在当地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到1927年,内蒙古地区的农民运动有了很大发展。1927年1月,绥远加入国民党党员共3600余人,其中以农民为最多(同上,第439页),根据形势分析,这些农民党员多数是农民协会会员。据是年7月统计,热河特别区的县级农会有9个,区级农会有13个,乡农会31个,村农会35个,会员发展到了5423人;察哈尔特别区也有1个县级农会,区农会4个,村农会82个,会员600人(同上,第19页)。

中共北方区委在开展内蒙古地区革命运动过程中,非常注意蒙汉民族、农工兵群众之间的联合,中共中央在《蒙古问题议决案》中明确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指导下的内蒙古农工兵大同盟。1925年冬天,在李大钊及中共北方区委其他主要领导人的主持下,在张家口诚洁旅馆召开了内蒙古农工兵大同盟成立大会,内蒙古热河、察哈尔、绥远特别区及其他地区的蒙汉各族代表200多人参加了大会,代表中有工人、农民、士兵及内蒙古各地中共党组织和国民党党部的负责人。京绥铁路总工会、张家口铁路分工会、电灯公司工会代表、冯玉祥的国民军也派代表参加了大会。李大钊在成立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演。大会讨论通过了内蒙古农工兵大同盟的纲领和任务,选举产生了中央领导机构,李大钊当选为内蒙古农工兵大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赵世炎、韩麟符当选为副书记,李大钊、赵世

炎、韩麟符、贾大容、郑丕烈、吉雅泰、李裕智、王仲一、陈镜湖、杨洪涛、锡尼喇嘛等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大会还作出了与冯玉祥的国民军建立合作关系的决议,并决定创办农工兵大同盟的机关刊物《农工兵》。大会之后,中共热、察、绥、包四个工委和中国国民党热、察、绥和内蒙古四党部,积极发展农工兵大同盟的组织,发展盟员。在热河、建平、赤峰、平泉、开鲁、林西、林东、围场、承德等县在农民和士兵中发展了大批盟员,建立了组织;在察哈尔、张家口以及察北各县的农民、洋车夫和警察中发展了盟员;在绥远,大同盟与工会、农民协会统一行动,联合开展工作,共同发动农工兵运动;在包头,主要是在“哥老会”会众中发展盟员,当时受大同盟指挥的“哥老会”会众达5万人之众。

第四节 主要革命活动

一、学生运动——声援“五卅”运动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中共绥远工委领导学生和各界群众,展开了声援“五卅”运动的反帝爱国斗争。中共绥远工委在吉雅泰书记的直接领导下,通过绥远学生联合会发动和组织归绥各校学生参加了这场斗争。

6月上旬,绥远学联在归绥旧城席力图召大院,主持召开了声援上海“五卅”惨案的各族各界群众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学生、工人、商人、市民约2000多人。绥远学联负责人介绍了五卅惨案的经过,讲述了上海工人、学生英勇斗争的事迹,特别是工人代表顾正红壮烈牺牲的英雄事迹,激起了与会者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腔仇恨,会场上响彻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死难同胞报仇”、“惩办杀人凶手”的口号。大会发出通电,对上海死难同胞的家属表示慰问并声援上海工人和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会后,举行了空前规模的示威游行,社会各界爱国人士和各校师生结队经过大街小巷,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回租界”等口号,掀起了全市性的反帝爱国运动的浪潮。

在中共绥远工委的领导下,绥远学联发动了归绥各校统一行动的3天总罢课。绥远学联设立的5个股,分别组织各校师生组成宣传队,深入大街小巷,进行宣传演说,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和宣传画。有的宣传队还挨门挨户宣讲,在宣传的同时进行募捐。学生们的宣传行动,激发了广大群众和各界人士的爱国热情,许多市民和商人纷纷向学生联合会捐款。民族资产阶级开办的“大盛魁”、“大德通钱庄”等商号,也积极捐赠。在短短的3天时间内,绥远学联共收到募捐银洋1000多元,当即全部寄到上海市学生联合会。

3天总罢课后,各校学生们继续利用业余时间结队上街进行宣传。6月下旬,各校又相继罢课。绥远学联组织宣传队到归绥城北的坝口子、乌素图、攸攸板和城西的兵州亥、什报气等近郊农村开展宣传活动。声援“五卅”运动的浪潮从城市向农村推进,逐步席卷了整个土默川。与此同时,绥远学联还派人到包头、萨拉齐、五原、临河等地联络进步势力,扩大“五卅”运动的影响。在包头,组织示威游行,吓跑了耶稣教外国牧师;在五原,地方绅士和县长出面接待绥远学联代表,并组织宣传“五卅”运动的群众大会;在临河,设置

局长接待学联代表,支持学生反对天主教的侵略活动;在萨拉齐,学生宣传队直接到耶稣教堂示威,并将育婴院的一批婴儿送入女子师范学校上学;在冯玉祥的国民军中,开展慰问将士的活动。

绥远学生的爱国运动得到了上海、济南、天津、北京等地学生联合会的支持。这些外地学联纷纷派代表或宣传队来到归绥,通过演讲和话剧演出等形式进行爱国主义宣传。绥远都统署教育厅长沙明远,曾在北京国民大学任教,他同情和支持北京国民大学学生宣传队在绥远的活动,号召绥远学生观看他们的演出。绥远旅京学生同乡会也派出宣传队回到归绥。在运动中,绥远学联还组织爱国学生捣毁了英商和记洋行,并在绥远五族学院和归绥中学开展了驱逐反动校长的活动。

二、农民运动——孤魂滩事件

1926年秋,国民军西撤河套,晋系军阀控制绥远地区,任商震为绥远特别行政区都统。

绥远地区地籍管理混乱,地户所有土地一般多于地照记载亩数。此外,还有部分供放牧所需的所谓夹荒余荒。商震提出要清丈地亩,重发地照,放垦夹荒余荒。清丈地亩多于原照记载部分,以荒地征收“押荒粮”和田赋,放垦夹荒余荒照收一切放垦费用。1926年冬,成立了归绥、萨拉齐、托克托、和林格尔、清水河、武川6县地亩清丈局。晋系周锦斋任清丈局局长,并拟于1927年春开始清丈。清丈地亩侵害了农村各阶层的利益,遭到普遍反对。

晋军进驻归绥以后,开放烟禁,并于1927年春,废除禁烟令,成立“善后局”,设卡征收过境烟税,征收烟灯税。此外,还扣发“善后流通券”。老百姓过年时屠宰牛羊猪鸡,也要征收“割头捐”。

1927年初,在和林格尔、归绥两县开始清丈地亩时,连续不断地爆发反清丈斗争。和林格尔县36个村发生反清丈暴动,驱赶清丈人员,阻止清丈。在归绥县毕克齐镇,中共党员贾力更、孟纯召开了反清丈群众大会,扣押了毕克齐丈地委员赵滁,当场没收其向农民搜刮所得的银元和大烟土,并将其游街示众,最后逐出毕克齐,为“孤魂滩”暴动拉开了序幕。

中共绥远地委和国民党绥远特别区党部共同协商决定,以国民党绥远特别区党部的名义,组织和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农民斗争。1927年3月26日,国民党绥远特别区党部召开会议,作出三项决议:一、组织农民示威游行;二、废除清丈费,释放因抗拒交纳清丈费而被监禁的农民;三、砸毁清丈局,捣毁县衙门,并决定召开以农民为主,有工人、学生、市民参加的群众大会。27日,召开中共党员、国民党员、共青团员以及工会、农民协会、学生联合会负责人会议,为即将召开的群众大会作了充分准备。会后,以鸡毛传帖向归绥周围的各级农民协会发出通知,定于28日上午,在归绥旧城城南的“孤魂滩”举行群众大会。

3月28日上午,归绥周围的蒙汉各族农牧民和城区的工人、学生及部分市民约五六千人,手执各色旗,肩扛铁锹、锄头、扁担、木棍等护身器械,从四面八方聚集到“孤魂滩”。

国民党左派人士、绥远特别区农民协会会长李正乐担任此次群众大会主席，中共绥远地委派路作霖担任副主席。共青团绥远地委书记杨曙晓在大会上发表了热情激昂的讲话，揭露奉晋军阀压榨绥远人民的罪行和绥远都统署清丈地亩、开放烟禁、扣发流通券的阴谋；赞扬归绥、和林格尔两县农民的反清丈斗争，号召与会者团结一致、共同斗争，争取胜利。之后，农民、工人、学生、妇女等各界学生代表先后登台讲话，整个大会群情激奋，“打倒贪官污吏”、“反对清丈地亩”、“反对开放烟禁”等口号不绝于耳。

大会结束后，路作霖、杨曙晓组织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游行队伍从孤魂滩出发，浩浩荡荡直奔财神庙街，捣毁了“归绥县地亩清丈局”，砸烂了清丈局的牌子和办公设施，烧毁了丈地文书。游行队伍继续沿小南街、大南街、大西街，向归绥县政府挺进。归绥县知事冯延铸及县府官员闻风而逃，示威队伍冲进县政府，捣毁了冯延铸的官邸。游行队伍行至大北街时，包围了驻在这里的财政厅、政务厅和教育厅，砸碎了3个厅的牌子。中午，游行队伍向新城进发，到绥远都统署请愿。商震避而不见，派其秘书赵伯陶登城回话，并将新城四门紧闭，派大批军警布防城楼。相持到傍晚，示威队伍散去。

游行途中，“回民促进会”理事艾辅庭和“明善堂”书局经理赵子南带领回民练武青年及“清佛教”善友参加了示威活动。旧城“大盛魁”、“上三元”、“裕合兴”、“天顺泰”、“聚生泰”等商号，以及一些钱庄、茶铺的店员伙计，在“大盛魁”经理段履庄的组织下，也参加了示威游行。

示威队伍散去后，绥远都统以为事态已经平息。不料第二天清晨，又有3千多名示威者再次聚集在新城西门前，强烈要求进城请愿。相持几小时后，商震被迫答应派代表进城。示威群众选派中共党员刘进仁、张焕文、陈志仁等15名代表入城。起初，商震仍拒绝见面，一直到深夜子时，商震才被迫出见。经过激烈的争论，商震接受了代表们提出的打倒清丈局；打倒政务厅长屠义源；打倒归绥县知事冯延铸；停止开放烟禁；反对扣发流通券等六项要求。

事后不久，商震发布了停止清丈地亩、严禁种植鸦片、照发“善后流通券”等三项命令，并将归绥县知事冯延铸撤职，基本上兑现了示威群众的要求，“孤魂滩”农民暴动取得了彻底胜利。4月7日，北京《晨报》以“空前未有之绥远市民示威运动”为题，详细报道了这一事件。

三、京绥铁路工人运动

京绥铁路始建于1905年4月，全线分京张（北京至张家口）、张绥（张家口至归绥）、绥包（归绥至包头）三期建成。京张段于当年9月24日建成通车；张绥段于1921年5月1日修通，9月1日通车；绥包段于1923年1月修成通车。至此，京绥铁路全线通车。京绥铁路全长886.16公里，设大小车站67个。

京绥铁路通车后，铁路工人劳动时间长、强度大、条件差、工资低、没有节假日。1921年5月，京张铁路工人为反对路局当权者违反路章，屡致重大撞车事故举行了第一次大罢工。在铁路工人两次要求路段负责人维护路章的请求遭到拒绝之后，被迫举行了全路性

机务工人大罢工,全部机车停开,最后迫使路局答应了工人罢工的要求,罢工斗争取得了胜利。

京绥铁路在陈世华任局长期间,他滥用职权,网罗亲信,并巧立名目,向帝国主义洋行订购大量不急需的车辆、材料,从中索取巨额回扣。陈世华仅向日本三井洋行就订购了价值 2500 万元的机车、货车、铁枕、枕木等,并按 15% 索收回扣。此外,他还向美国太康洋行订购货车 600 辆,价值 230 万美元,除付 40 万元之外,其余全部折成期票,如逾期不付,则付年利息 8 厘,付清为止。凡此种种,致使路局负债累累,经常拖欠工人工资。1921 年 12 月 10 日,全路工人公举各处课课长出面,要求会计处长李懋勋发放 11 月份薪水。李不但不发工资,还辱骂、殴打工人代表,铁路当局却置之不理。13 日,京绥铁路工人举行了全路机务工人大罢工,并向交通部控告陈世华、李懋勋的罪行,强烈要求严加查处。当时北京《新社会报》以“京绥完全停顿”为题,报道了这次罢工斗争。与此同时,罢工工人代表团果断地夺回会计权利,推出临时会计,打开金库,发放工资。北京政府交通部迫于工人的压力,免去陈世华的京绥铁路局长职务,由沈琪接任局长。

1922 年京绥铁路总工会及其八大分会成立后,京绥铁路工人运动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人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1922 年 6 月 12 日,美国太康洋行通过外交途径催债,交通部总长高恩洪迫于压力,与美国太康洋行签订了《展期合同》,美国太康洋行控制了京绥铁路经营权。高恩洪的卖路行径激起了全路工人的愤慨,在车务工人同人会的领导下,8 月 6 日召开了铁路工人和员司大会,组织了“救国护路团”,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各站纷纷集合抗议。7 日,车务工人同人会派林竞等 13 名代表到北京铁路总局请愿,向交通部呈文,揭露高恩洪与太康洋行所签合同的卖路实质,并限在一星期内完全取消这项合同。9 日,车务工人同人会又发表《京绥铁路同人会反对交通部丧权之宣言》。高恩洪不仅不接受工人的要求,反诬同人会无理取闹。19 日,全路工务、机务、车务工人及总局员司 600 多人集会,决定如不取消亡路合同,京绥铁路即与交通部断绝隶属关系独立,并向交通部发出“哀的美敦书”。21 日,500 多人组成请愿队伍,高举“京绥铁路同人救国护路请愿团”的大旗,举行示威游行。请愿团先后到众议院、参议院、国务院请愿。22 日,请愿团直奔总统府,陈述请愿情由,要求惩办祸路罪魁和卖路主使者,并提出京绥铁路自行管理。高恩洪调动 200 多名警察和保安队伍,驻守京绥铁路局,企图武装镇压罢工运动。同人会没有屈服于反动当局的武装恫吓,30 日再次向国会呈文,请求依法提案弹劾,以彰法治。与此同时,全国各界联合会为声援京绥铁路救国护路运动,通电全国,要求取缔卖路合同,驱逐卖路人,整顿路务。京绥铁路员工的持续斗争和全国人民的声援,迫使交通部撤回亡路合同并惩办了陈世华,维护了京绥铁路的管理权。

1922 年,由于军阀混战,路政腐败,工人整整八个月没有领到工资。9 月 19 日,新任余局长下令给全路员司人增月薪 5 元,至于对所欠工人工资,只字未提。车务同人会代表全路工人,向路局连续三次提出发放欠薪和增加工资的请愿书,均遭拒绝。何孟雄适时在

张家口召开车务工人代表会议,决定举行车务工人索薪大罢工。经过充分准备,组织了工人纠察队、宣传队、敢死队,拟定了“争平等、争人权、争自由、争待遇”、“工人要有饭吃,不能拿工人当牛马”、“允许工人组织工会合法存在”、“工人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等口号,并提出7项罢工条件,以京绥铁路车务同人联合总会名义,呈交路局。同时发表《京绥铁路车务工人为罢工告各界同胞书》和《京绥铁路车务工人罢工宣言》,要求补发欠薪,增加工资,改善工人生活,以维持生计。10月26日,工人代表到路局请愿,要求在24小时内答复罢工条件,否则实行全路罢工,但又遭路局拒绝。车务同人会立即通知铁路沿线八大同人会,于27日举行了京绥铁路全线总罢工。28日,交通部总长高恩洪迫于罢工斗争的强大压力,答应了罢工工人的基本要求,罢工斗争取得了胜利。29日,车务同人会发表《京绥路罢工胜利宣言》,肯定了罢工的成绩,总结了团结斗争的经验,并宣布即日复工。

1925年末,冯玉祥的国民军与奉系军阀交战,京绥铁路饱经战争灾难,铁路工人两个多月没领到工资,生活极端困窘,路局却不予理睬。中共张家口地委和京绥铁路总工会及时发动了铁路工人索薪运动,提出按时发放工资、保障工人工作安全、改善福利待遇、不得随意开除工人等要求。并在京绥铁路各次列车上张贴索薪运动的标语,同时向冯玉祥的西北督办公署发函说明运动的缘由,请求督办公署的帮助。包头、归绥车站首先举行了罢工,沿线各站积极响应。声势浩大的索薪运动,迫使京绥铁路当局电邀工人代表赴京谈判。京绥铁路总工会委员长王藻文在纠察队的保护下,毅然赴京谈判。经过3天的据理力争,京绥铁路当局答应了发放工薪的要求,索薪运动取得胜利。

四、建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

20世纪初期,内蒙古追求民主解放的政坛上颇有影响的蒙古族人士恩克巴图、白云梯等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护法运动。1924年底,白云梯随孙中山北上,发动国民会议运动。他在北京又联络了乐景涛、金永昌、李丹山、包悦卿等蒙古族社会人士,他们都支持组织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达斡尔族青年郭道甫在北京外交部俄文专修学校读书,兼作蒙藏学校教员。是年,因蒙藏学校招生而到蒙古人民共和国,还到苏联进行了考察,与苏蒙方面建立了联系。回国后便与白云梯一起筹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被软禁在北京的伊克昭盟札萨克旗“独贵龙”运动首领旺丹尼玛活佛、隐居在北京雍和宫的伊克昭盟乌审旗“独贵龙”运动的首领锡尼喇嘛,他们经常与白云梯、郭道甫联系,就发动内蒙古自治运动和组建民族解放政党等问题取得了共识。

中国共产党对于组建内蒙古蒙古民族的政党问题给以极大的关注。国共合作形成后,李大钊与孙中山对蒙古民族问题及组建蒙古民族政党问题也达成了一致的认识。中国共产党在帮助孙中山组建北方国民党组织的同时,也积极支持和指导建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李大钊组织蒙藏学校的一批蒙古族青年荣耀先、李裕智、吉雅泰、多松年、奎璧、佛鼎、云泽、王瑞符、特木尔巴根以及在北京的白海风、吴文献等参加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筹组活动。

1925年1月13日,在北京召开了“内蒙各盟旗各团体代表大会”,50余人出席大会,

讨论通过了《内蒙各盟旗各团体代表大会宣言》(日本国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外务省记录:A—61—2—1—14)。宣言声明:“卓索图、昭乌达、哲里木、锡林郭勒、伊克昭、乌兰察布6盟及察哈尔、呼伦贝尔、齐齐哈尔、阿拉善、额济纳、西土默特等地蒙人代表,在北京开内蒙各盟旗各团体代表大会,讨论内蒙如何革新之问题,咸以为非开内蒙国民代表大会,绝不足以解决此等重大问题,尤以为非议定内蒙古自治事宜,绝不足以筹画其善后办法……”接着从6个方面阐述了召开内蒙古国民大会的理由,并宣布了大会所讨论的6项基本主张。组成了有15名行政委员的筹备委员会,推选白云梯为委员长、郭道甫为副委员长。这次大会的基本主张是在拥护五族共和,巩固中华民国的基础上实行内蒙古地方自治,而且主张蒙汉合作,权利平等,并与同情内蒙古地方自治的国内各方面取接近之态度。

1925年7月间,内蒙古国民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负责人白云梯、郭道甫等先后从北京到达张家口,筹备成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共产国际驻内蒙古代表奥齐罗夫、中共北方区委书记、中国国民党北京政治委员会负责人李大钊,相互配合、协调一致,以指导组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10月13日,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张家口土尔沟街召开。来自内蒙古哲里木、昭乌达、卓索图、锡林郭勒、乌兰察布、伊克昭等6盟,察哈尔、归化土默特、巴尔虎、达斡尔、索伦、阿拉善、额济纳、厄鲁特、青海等盟部旗蒙古民族中有志于民族解放事业的约百名代表出席大会。还有一批来自北京和内蒙古东西部地区的蒙古族青年也列席了大会。共产国际驻内蒙古代表奥齐罗夫、中国共产党代表江浩和王仲一、中国国民党代表李烈钧、冯玉祥国民军代表察哈尔都统张之江以及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书记丹巴道尔计等出席大会并祝贺。放眼全国,着眼内蒙古,拯救国家,振兴民族,成为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会上制定了党的纲领,作出了决议、决定,选举产生了党的领导机构,通过并发表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告全体民众宣言书》(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外务省记录,蒙文原件A—6—1—2—1—14)。宣言公布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政治主张和宗旨:1. 中国境内的各族人民,争取自主决定和管理自己事务主权;2. 中国人民消灭帝国主义和国内贪婪残暴者,建立真正的民权政府之时,我内蒙古的蒙古人也要建立民权革命政府;3. 广大民众不分男女,均有平等参政之权。宣言称这次大会的召开,是内蒙古大地放射出的振兴民族的曙光。

大会选举产生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由14名执行委员和7名候补执行委员组成。同时从中选出白云梯、郭道甫、金永昌、福明泰、乐景涛、包悦卿、李丹山等7名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选举白云梯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郭道甫任秘书长、金永昌代理组织部长。中共党员吴子微和旺丹尼玛、锡尼喇嘛两位“独贵龙”运动首领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共党员李裕智(李若愚)、吉雅泰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中共党员佛鼎、多松年、云泽、王瑞符、奇子俊等人出席了大会。

大会决定创建内蒙古人民革命军,创办内蒙古军官学校,出版《内蒙国民旬刊》和《内蒙画报》。

五、成立内蒙古农工兵大同盟

1925年秋,中共中央在《蒙古问题议决案》中明确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指导下的内蒙古农工兵大同盟,并指出内蒙古农工兵大同盟与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工作应当密切的联络”,这是蒙汉民族的革命斗争以至内蒙古的“革命工作能够有成效的一种保证”(《内蒙古统战史档案史料选编》(一)第5页,1987年)。

1925年冬,在李大钊及中共北方区委其他领导人的主持下,在张家口诚洁旅馆召开了内蒙古农工兵大同盟成立大会,内蒙古的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特别区及其他地区的蒙汉各族代表200多人参加了大会。代表中有工人、农民、士兵及内蒙古各地中共党组织和国民党党部的负责人。京绥铁路总工会、张家口铁路分会和电灯公司工会的代表,冯玉祥的国民军也派代表参加了大会。

李大钊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演,他从内蒙古地区的实际出发,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纲领以及内蒙古农工兵大同盟的任务,指出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目前正加紧了对内蒙古的侵略;各路军阀也激烈争夺对内蒙古三特别区的控制权,两次直奉战争以及他们正在准备联合起来进攻冯玉祥的国民军,就是证明。他还针对内蒙古地区的民族问题,“特别强调蒙汉两族人民联合起来谋求解放的重要意义,并一再指出,蒙古族人民必须和汉族人民团结一起,才能谋求自身的解放”(吉雅泰:《李大钊同志和内蒙古初期的革命活动》,《民族团结》1961年第7期)。要求内蒙古农工兵大同盟通过自己的组织,在内蒙古各族人民中广泛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揭露军阀混战的本质,动员各族人民起来反侵略、反军阀。

大会在讨论通过内蒙古农工兵大同盟纲领和任务后,选举产生了中央领导机构。李大钊当选为内蒙古农工兵大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赵世炎、韩麟符当选为副书记;李大钊、赵世炎、韩麟符、贾大容、郑丕烈、吉雅泰、李裕智、王仲一、陈镜湖等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大会还作出了与冯玉祥合作的决议,并决定创办农工兵大同盟的机关刊物《农工兵》。

大会之后,中共热、察、绥、包四个工委,中国国民党热、察、绥和内蒙古四党部,积极发展农工兵大同盟的组织,发展盟员。在热河、赤峰、建平、平泉、开鲁、林西、林东、围场、承德等县的农民和士兵中发展了盟员,建立了组织;在察哈尔、张家口以及察北各县的农民、洋车夫和警察中发展了盟员;在绥远,大同盟与工会、农民协会统一行动,联合开展工作,共同发动农工兵运动;在包头,主要是在“哥老会”中发展盟员。当时受农工兵大同盟指挥的“哥老会”会员达5万之众。

六、争取冯玉祥及其国民军参加革命

在第二次直奉战争正在激烈进行的时候,直系军阀吴佩孚的部属冯玉祥开始倾向革命,于1924年10月23日率部从前线倒戈回北京,举行著名的北京政变,推翻贿选总统曹锟,把所属部队改称国民军,冯玉祥任总司令。皖系军阀头子段祺瑞任北京政府临时执政。同年12月18日,段祺瑞任命冯玉祥部下张之江为察哈尔特别区都统。1925年1月,任命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督办公署设在张家口。同时任命国民军第1军第6师师